

第八届「诗经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刊之二

詩經研究丛刊

第十七辑

中国诗经学会
河北师范大学 编

诗经研究丛刊

第十七辑

(第八届《诗经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刊之二)

中国诗经学会 编
河北师范大学

学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经研究丛刊. 第 17 辑/中国诗经学会, 河北师范大学编. —
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 - 7 - 5077 - 3377 - 8

I. 诗… II. ①中…②河… III. 诗经—文学研究—丛刊
IV. I207. 222 - 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5983 号

责任编辑: 战葆红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

网 址: www. book001. com

电子信箱: xueyuan@ public. bta. net. cn

销售电话: 010 - 67675512、67678944、67601101 (邮购)

印 刷 厂: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开本尺寸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2. 25

字 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0. 00 元

目 录

《诗纬》与《齐诗》关系考论	王长华 刘 明(1)
《从文学到经学》序	刘毓庆(26)
歌诗·赋诗·引诗·说诗	
——先秦时期《诗经》接受观念的演变 ...	韦春喜 张 影(37)
宋代金文著述引《诗》论略	谭德兴(54)
说《芣苢》	
——兼谈周人对夏文化的继承	张崇琛(76)
日本现代的《诗经》	
文化人类学研究	[日本]篠田幸夫 李寅生 译(90)
清代《诗经》音学研究述评	张鹏飞(109)
《诗经》中的周代陕西诗歌考论	刘生良(126)
缘情“言志”与“中和”、“激切”之美	
——诗、骚诗学思想浅论之一	潘啸龙(141)
《诗经》叙事诗的空间认识	[日本]大野圭介(142)
《诗纬》与两汉魏晋叙事文学	张慧敏(154)
《诗》叙事变化管窥	
——以《氓》、《节南山》、《生民》为研究中心	谢德胜(169)

对《诗经》中性爱描写的考察

- 以《国风》为中心 [韩国]李相宝(183)
- 《诗经》中的草原游牧文化 王开元(189)
- 论汉代毛诗学中的贞节观及其成因 李世萍(199)
- 《诗经》中的数字文化及其审美意蕴 卓 雅(209)
- 永恒的追寻——《蒹葭》诗旨探微 (香港)蔡若莲(232)
- 《诗经》的奥妙——景情与音义
- 的双重合奏 [美国]吴少达(245)
- 《诗经》中“同姓臣”的尴尬与反叛 李会玲(250)
- 《诗经·陈风·宛丘》主旨辨正
- 兼及《诗经》主旨阐释的方法问题 龙文玲(262)
- 苏辙与朱熹《诗经》诠释之比较 (台湾)吴叔桦(279)
- 经典的形成与宋代诗经学的特色 (台湾)黄雅琦(303)
- 元代的《诗经》注本与“股”体时文
- 兼与宋代“股”体时文比较 张祝平(319)
- 《诗毛氏传疏》与宋人《诗》说
- 从种村和史先生的有关论文谈起 郭全芝(336)
- 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到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
- 钟惺对《诗经》评点的评价 侯文冉(350)
- 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早期典籍中
- 妇女的“嘯” 晏鸿鸣 张莹 吴谷英 李静 罗秀玲(357)
- 李学勤主编标点本《毛诗正义》点校献疑 赵茂林(372)
- 朱熹《诗集传》校勘札记二则 陈 才(382)

《诗纬》与《齐诗》关系考论

王长华 刘 明

《诗纬》是与《诗经》相配的汉代纬书之一种,也是汉代《诗经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《诗纬》以天人感应学说为理论基础,认为人的情性与历、律相通,将《诗》三百篇与天干地支相联系,以阴阳灾异观测人事,推知王朝兴衰,君臣关系,以“四始”、“五际”具体推算“革命”、“革政”的关键时期,从而形成了与汉代四家诗不同的解诗特色。但由于其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与四家诗大致相同,因此其中有不少说解也难免与四家诗时有相通,尤其是与《齐诗》相通处为多。《诗纬》与《齐诗》的相通和相近不仅表现在对《诗经》篇章内容的说解方面,甚至在解诗模式方面也时有相通和相同。比如强调以“五际”解诗就是典型一例。这种现象说明《诗纬》与《齐诗》之间的关系理应是密切的。对此,清人陈乔枏曾进行过探讨,陈氏在其所著《诗纬集证·自叙》中说:“魏、晋改代,齐学就湮,隋火之余,《诗纬》渐佚。间有存者,或与杂讖比例齐观,学者弃置勿道,书遂尽亡。夫齐学湮而《诗纬》存,则《齐诗》虽亡,而犹未尽泯也。《诗纬》亡,而《齐诗》遂为绝学矣。曩者先大夫尝辑三家诗佚义,以《诗纬》多齐说,其于诗文无所附者,亦补缀之,以次于齐,所以广异义,扶微学也。”^[1]他认为《诗纬》多齐说,而《齐诗》因《诗纬》尚存而不至于成为绝学,《齐诗》与《诗纬》在传承上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如此说来,原本属于“经”学阵营一员的《齐诗》,如果

真的能够与属于“纬”学系统的《诗纬》建立起有机联系,之间必有一个可以沟通两者的桥梁。

事实上翼奉的《齐诗》学就起到了这个桥梁作用。翼奉原本是《齐诗》学的传人之一,而他的《诗经》学又与《诗纬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清代已有学者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。如沅鹤寿在其《齐诗翼氏学》中就曾直接拿《诗纬》与《齐诗》翼氏学进行过比照研究。^[2]陈乔枏更具体地指出了《诗纬》与翼奉《齐诗》学间的相合处,谓:“翼氏《齐诗》,言五性、六情,合亥午相错,败乱绪业之辞,与《诗汜历枢》言午亥之际为革命,合已哉。”^[3]这样一来,《诗纬》与《齐诗》的关系似乎就变成了《诗纬》来源于《齐诗》翼奉学,而《齐诗》翼奉学则是直接属于《齐诗》系统的。尽管沅、陈二氏并未直接申明《诗纬》与《齐诗》的确切关系,但后人包括今天学界一般都由此而认定《诗纬》是源自《齐诗》的。也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,不少学者在讨论《齐诗》的问题时便不加论证不做说明而直接引《诗纬》内容加以证明,^[4]仿佛《诗纬》与《齐诗》就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关系。诚然,有《齐诗》才有翼奉《齐诗》学,而《诗纬》又颇受翼奉《齐诗》学影响。但是,在汉代四百年间的学术发展中,政治对学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,学派内部与学派之间的对立与融合,使得有汉一代的学术发展出现了相当复杂的情况。概言之,可谓继承与创新并存,“通义”与“别义”同在,那么《齐诗》的发展亦当不会不如此。本文下面将对汉代《齐诗》传承材料与《诗纬》现存辑佚资料予以考辨,在此基础上,从微观角度具体考察《齐诗》学与《诗纬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,从而更加清晰地展现和确认《诗纬》与汉代《齐诗》的关系。

一、《齐诗》与翼奉《齐诗》学

探讨《齐诗》与翼奉《齐诗》学的关系,首先需要对汉代《齐诗》的基本状况有一个了解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较为详细地勾画了西汉经学发展的情况。我们据此,并结合《齐诗》重要学者的本传,先对《齐诗》的传承以及《齐诗》的特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。

(一) 西汉《齐诗》的传承及其重要学者

汉代《齐诗》的创始人是轅固。轅固,“齐人也。以治《诗》孝景时为博士”,^[5]可见因轅固是齐人,其所传《诗》被称为《齐诗》。关于轅固传《诗》的具体内容,当时文献均无记载,只是于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和《汉书·儒林传》中记录着其基本相同的三件事:在景帝面前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、敢于触犯窦太后而称窦太后所好的《老子》为“家人言”,还有劝诫公孙弘“务正学以言,无曲学以阿世”。从此三事似可窥见《齐诗》首传人性格之所在:执著于先秦儒家经义,传承儒家“天下为公”思想,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,正直而近于固执。徐复观也因此认为轅固“在皇权鼎盛的皇帝面前,强调汤、武革命,可谓能把握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真精神,其所习者当不仅限于《诗》”。^[6]我们且不论轅固所学是否仅限于《诗》,仅从其性格及对经义的持守精神,完全可以想见《齐诗》传授之初应该是坚持《诗》之本义而不作过多推衍的。

轅固弟子众多,而其中又以夏侯始昌最明。^[7]《汉书·眭两夏侯京翼李传》载:

夏侯始昌,鲁人也。通《五经》,以《齐诗》、《尚书》教授。自董仲舒、韩婴死后,武帝得始昌,甚重之。始昌明

于阴阳,先言柏梁台灾日,至期日果灾。时昌邑王以少子爱,上为选师,始昌为太傅。年老,以寿终。^[8]

作为《齐诗》的传承人之一,夏侯始昌得到了众多的关注。之所以被认为“最明”,恐怕根本原因还在于有武帝的格外重视。之所以倍受武帝重视,则是因为其学说符合武帝的“口味”。那么,夏侯始昌学说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?据上述“自董仲舒、韩婴死后,武帝得始昌,甚重之”,可推测夏侯始昌与董仲舒、韩婴的学术思想、学术路向应该是一致的。众所周知,董仲舒是武帝时以说阴阳灾异、天人感应闻名朝野而深得武帝重用的,同时他认为《诗》无达诂,“从变从义,而一以奉人”,也就是说他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依据,而以阴阳灾异去阐释《诗》等其他经书的经义的。韩婴是《韩诗》的创始人,也通《易》学,其解“经”方式与时人不同,此人解《诗》“推诗人之意,而作内外传数万言,其语颇与齐、鲁间殊”,解《易》,“推《易》意而为之传”,^[9]可见韩婴是善于推衍做《传》来解释经义的,且《易》原本就是上古以来的占卜之书,其思想内涵亦与阴阳灾异相通。而夏侯氏“明于阴阳”,又准确预言了柏梁台灾,可见他也和董仲舒、韩婴一样熟谙阴阳灾异之说,依托于天人感应理论,是善于对经文做推衍式的解说的。其传《齐诗》似亦应如此。此种表现、此种特色与乃师辕固的说《诗》已表现出明显的不同。阴阳灾异的思想 and 特色就这样被带入了《齐诗》的传授系统之中。夏侯始昌之后,有东海后苍继续《齐诗》的传承。“后苍字近君,东海郯人也。事夏侯始昌。始昌通《无经》,苍亦通《诗》《礼》,为博士”。^[10]后苍从夏侯始昌学《齐诗》,同时又向孟卿学《礼》。“孟卿,东海人也。事萧奋,以授后苍、鲁国丘卿。苍说《礼》数万言,号曰《后氏曲台记》”。^[11]而孟卿善为《礼》、《春秋》,其《春秋》之学是源

自胡毋生的《公羊春秋》学，^[12]这一派也是以言阴阳灾异见长的。这样一来，后苍的学术其实兼及夏侯始昌与孟卿的学术，也就是说他兼有阴阳灾异化了的夏侯氏《齐诗》学和以奢谈天人感应为鲜明特色的《春秋公羊》学，所以后苍治《齐诗》，当不会不涉及阴阳灾异的内容。后苍授学三弟子：萧望之、翼奉、匡衡，^[13]三人都以《齐诗》学闻名，也均位至达官显贵，遂推动《齐诗》达至全盛时期。《汉书》皆有传。萧望之本转载：

萧望之字长倩，东海兰陵人也，徙杜陵。家世以田为业，至望之，好学，治《齐诗》，事同县后苍且十年。以令诣太常受业，复事同学博士白奇，又从夏侯胜问《论语》、《礼服》。京师诸儒称述焉。……时上初即位，思进贤良，多上书言便宜，辄下望之问状……累迁谏大夫，丞相司直，岁中三迁，官至二千石。……望之为左冯翊三年，京师称之，迁大鸿胪。……（元帝）制诏御史：“国之将兴，尊师而重傅。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，道以经术，厥功茂焉。其赐望之爵关内侯，食邑六百户，给事中，朝朔望，坐次将军。”

翼奉本转载：

翼奉字少君，东海下邳人也。治《齐诗》，与萧望之、匡衡同师。三人经术皆明，衡为后进，望之施之政事，而奉悖学不仕，好律历阴阳之占。元帝初即位，诸儒荐之，征待诏宦者署，数言事宴见，天子敬焉。……上以奉为中郎，召问奉：“来者以善日邪时，孰与邪日善时？”明年夏四

月乙未，孝武园白鹤馆灾。奉自以为中，上疏曰：“臣前五际地震之效，日极阴生阳，恐有火灾。不合明听，未见省答，臣窃内不自信。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，时加于卯，月宿亢灾，与前地震同法。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。不胜拳拳，愿复赐间，卒其终始。”……奉以中郎为博士、谏大夫，年老以寿终。

匡衡本转载：

匡衡字稚圭，东海承人也。父世农夫，至衡好学，家贫，庸作以供资用，尤精力过绝人。诸儒为之语曰：“无说《诗》，匡鼎来；匡说《诗》，解人颐。”…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，当世少双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；后进皆欲从衡平原，衡不宜在远方。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、少府梁丘贺问，衡对《诗》诸大义，其对深美。望之奏衡经学精习，说有师道，可观览。……辟衡为议曹史，荐衡于上，上以为郎中，迁博士，给事中。……衡为少傅数年，数上疏陈便宜，及朝廷有政议，傅经以对，言多法义。上以为任公卿，由是为光禄勋、御史大夫。建昭三年，代韦玄成为丞相，封乐安侯，食邑六百户。

由上述记载，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萧、翼、匡三人都因《齐诗》学而入仕，并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之中，影响着宣、元、成三帝时期的政局，也使《齐诗》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。而且，同是接受于后苍的《齐诗》，而在三人那里则有了不同的发展：萧望之“施之政事”，把对《经》义主要是《诗》义的

理解落实于治理国家、处理政事方面；翼奉虽“悖学不仕”，专心于《诗》之经义研究，但他又好律历阴阳之占，多次以阴阳五行来解释灾异现象；匡衡坚持“师道”，“其对深美”，当朝廷有政议时，则多据经义而提出对策。由此可见，萧、匡二人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《齐诗》的说解，只是将其应用于政治，对学术建构和传承方面并无推进。但翼奉却独好律历、阴阳五行之说，并以此持说，上疏皇帝，把夏侯始昌以来原本就充斥着阴阳灾异色彩的《齐诗》学更往前推进了一步，导入更加神秘的占验之中。《诗》几乎变成了占验阴阳、预测灾异的占卜之书，从而逸出了此前经学的范围。如果说翼奉以前的《齐诗》只是掺杂了以阴阳灾异说《诗》的某些因素，那么翼奉的《齐诗》学，则是径直以阴阳五行解诗，以《诗》去解释现实中的灾异现象了。这绝不仅仅是一个“量”的增加，而是产生了“质”的飞跃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徐复观在讨论《齐诗》辑佚问题时认为，“其遗说见于《汉书》萧望之、匡衡、师丹各传奏疏中的，多为诸家之通义”，“至于《翼奉传》所载翼奉‘四始五际六情’之说，乃受夏侯始昌以阴阳五行傅会《洪范》言灾异的影响，他这一趋向拓展于《诗》的领域，而更向旁枝曲径上推衍，以成怪异不经之说，既无与于《诗》教，亦非轍固之所及料。”^[14]正因为认为翼奉的《齐诗》学已逸出《齐诗》之通义，所以徐复观先生坚持搜集汉代《齐诗》遗说，应以萧望之、匡衡、师丹奏疏中所引《诗》为主，而不能到翼奉诗说中去寻找。

然而，作为同出于后苍门下的三门徒，虽然在具体的解《诗》方式和内容方面存在某些差异，但是他们毕竟同师于一人，传授的经义也应该是一样的，也是属于《齐诗》学范围内的。所以先生将翼奉学完全割离《齐诗》这个“母体”，似乎也有过于武断之嫌。应该说，翼奉的《齐诗》学是在《齐诗》通义的基础上做了发挥，有了进

一步的发展和变化,甚至成为《齐诗》的“别义”。下面我们就依据《齐诗》部分传承学者的资料,和《汉书》中记载的萧望之、匡衡在各自奏疏中谈《诗》、引《诗》的情况,推求一下《齐诗》的特征(或者说“通义”),以此来分析判断翼奉氏《齐诗》学中哪些理论与这些特征相同,又有哪些理论成为“别义”,从而探究翼奉《齐诗》学与《齐诗》具体而微的关系。

(二) 西汉《齐诗》特征及与《齐诗》翼氏学之关系

西汉《齐诗》的特色,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以《诗》作为劝谏的工具,以《诗》义比附政治。

作为汉代《诗》学之一种,《齐诗》同其他解《诗》之作一样,是具备“谏书”的功能的。其基本模式是依据《诗》的内容,联系《诗》中历史人物或事件,用以规劝当时的统治者要效法古人修明政治。这在萧望之、匡衡的奏疏中都有表现。比如在面对由于征讨西羌而造成的陇西以北、安定以西民众缺粮问题时,张敞建议罪轻者可以通过上缴谷物救济上述地区百姓来赎罪的时候,萧望之则认为:

古者藏于民,不足则取,有余则予。《诗》曰:“爰及矜人,哀此鰥寡”,上惠下也。又曰“雨我公田,遂及我私”,下急上也。今有西边之役,民失作业,虽户赋口敛以贍其困乏,古之通义,百姓莫以为非。以死救生,恐未可也。陛下布德施教,教化既成,免舜亡以加也。今议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,臣窃痛之。^[15]

萧望之引《诗经·小雅·鸿雁》和《小雅·大田》诗句,借以证明古时帝王与民众的关系:朝廷物资充足时则惠及百姓,而朝廷物资不足时则取之百姓,这是“古之通义”,所以,他劝谏遵从古人的

做法,而不要听从张敞的建议,避免开利路而伤教化。

匡衡引《诗》劝谏皇帝的情况在《汉书》本传中记载的更多,限于篇幅,仅举一例以见一斑。

元帝崩,成帝即位,衡上疏戒妃匹,劝经学威仪之则,曰:

“陛下秉至孝,哀伤思慕不绝于心,未有游虞弋射之宴,减隆于慎终追远,无穷已也。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,犹复加圣心焉。《诗》云‘萋萋在疚’,言成王丧毕思慕,意气未能平也,盖所以就文武之业,崇大化之本也。”

鉴于成帝对于元帝去世的悲伤,匡衡引《诗经·周颂·闵予小子》之诗,以与成帝经历相似的成王为例,劝成帝:致哀的同时更要继承汉代大业,以经学教化为本。其实,这种以《三百篇》为谏书的做法,不仅为《齐诗》之通义,汉代其他三家诗也大体如此。

第二,以“情性”论《诗》。

注意到《诗》中的“情性”因素,是汉代《诗》学对于先秦“诗言志”观念的一个突破与发展。虽然汉代四家诗都有关于《诗》中“情性”的论述,但鲁、韩、毛三家论《诗》只是与“情性”论偶有关合,^[16]而《齐诗》则将“情性”真正引入对《诗》的解说之中,从而使“情性”论《诗》成为《齐诗》的一个重要特征,这在匡衡与翼奉的奏疏中也有明确体现。由于此处着重讨论《齐诗》之通义,因此仅以匡衡的“情性”论《诗》为例。匡衡《上元帝疏》云:

陛下圣德天覆,子爱海内,然阴阳未和,奸邪未禁者,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,争言制度不可用也,务变更

之，所更或不可行，而复复之，是以群下更相是非，吏民无所信。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，而虚为此纷纷也。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，留神于遵制扬功，以定群下之心。《大雅》曰：“无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。”孔子著之《孝经》首章，盖至德之本也。传曰：“审好恶，理情性，而王道毕矣。”能尽其性，然后能尽人物之性；能尽人物之性，可以赞天地之化。

臣又闻室家之道修，则天下之理得，故《诗》始《国风》，《礼》本《冠》《婚》。始乎《国风》，原情性而明人伦也；本乎《冠》《婚》，正基兆而防未然也。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，道之衰莫不始于闾内。

臣闻《六经》者，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，著善恶之归，明吉凶之分，通人道之正，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。

从匡衡疏文来看，他是相当重视《诗》中表现的“情性”作用，引“传曰‘审好恶，理情性，而王道毕矣’”认为能“尽人物之性”，才能“赞天地之化”；《诗》始《国风》，是因为《国风》能够“原情性而明人伦”；同时认为《六经》是“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”的经典之作，其与人的本性也是没有背离的。这些都说明，匡衡论《诗》的“情性”意识比较浓厚，他注意到了作为主体的情感。陈乔枬云：“雉圭（匡衡）与少君（翼奉）同师，‘《诗》原情性’之语，授受渊源，其来有自矣。”^[17]以“情”说诗，并进一步运用到政治中去，是《齐诗》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在《齐诗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第三，论《诗》杂以阴阳五行、天人感应之说。

以阴刚五行、天人感应理论说《诗》，可以说是《齐诗》相较于其他三家的一个最显著特征。从上文提到的《齐诗》传承情况看，《齐

诗》最晚到夏侯始昌,已掺入了阴阳五行学说,^[18]使《齐诗》的解诗开始奢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。由后苍传授给萧望之、翼奉、匡衡,说诗杂以阴阳五行、天人感应,则成为《齐诗》的重要特征。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载:

时大将军光薨,子禹复为大司马,兄子山领尚书,亲属皆宿卫内侍。地节三年夏,京师雨雹,望之因是上疏,愿赐清闲之宴,口陈灾异之意。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,曰:“此东海萧生邪?下少府宋畸问状,无有所讳。”望之对,以为“《春秋》昭公三年大雨雹,是时季氏专权,卒逐昭公。向使鲁君察于天变,宜亡此害。今陛下以圣德居位,恩政求贤,尧舜之用心也。然而善祥未臻,阴阳不和,是大臣任政,一姓擅势之所致也。附枝大者贼本心,私家盛者公室危。唯明主躬万机,选同姓,举贤才,以为腹心,与参政谋,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,明陈其取,以考功能。如是,则庶事理,公道立,奸邪塞,私权废矣。”

灾异现象本是一种自然现象,但在萧望之以及言“天人感应”在学者的眼中,它一定是因为人间的不平事而导致上天震怒的结果,这种震怒又以灾异的形式降落人间,以引起帝王的重视。在上面这篇疏文中,萧望之就强调了“京师雨雹”,与《春秋》昭公三年“大雨雹”同样是因为有大枝专权危及到皇帝的统治,从而导致“天变”而形成的。这是“天人感应”学说的典型运用,也是萧望之《齐诗》学掺杂有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证据。

由匡衡奏疏考察他的《诗》学;也可以发现其中较为明显的以阴阳五行、天人感应说《诗》的内容。他在《上元帝疏》中所说的

“臣闻天人之际，精祲有以相荡，善恶有以相推，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，阴阳之理各应其感，阴变则静者动，阳蔽则明者跪，水旱之灾随类而至。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，或至相食，此皆生于赋敛多，民所共者大，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。”^[19]是典型的天人感应观念。考匡衡所学，发现他仅从后苍学《齐诗》，所以匡衡《齐诗》学中亦应充满天人感应的理论内容。

第四，以地理、风俗说《诗》。

对于《齐诗》以地理、风俗说《诗》的特点，江乾益说：“骆子受《禹贡》之影响，创大九州之说，其法则先列中国名山大川，物类所珍，因而推及海外所不能睹者，阴阳家好相阴阳消长之外，并好言地理；天文地理之学，实出自齐学之畛域也。”^[20]认为邹衍的“大九州”理论包含了一定的地理学观念，地理学是齐学的内容之一。齐学中杂阴阳五行因素比较多，《齐诗》以地理、风俗说《诗》在四家诗中确实比较突出。如匡衡上书云：“臣窃考《国风》之诗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被贤圣之化深，故笃于行而廉于色。郑伯好勇，而国人暴虎；秦穆贵信，而士多从死；陈夫人好巫，而民淫祀；晋侯好俭，而比畜聚；太王躬仁，邻国贵怨。”根据颜师古的注解，匡衡所论《郑风·大叔于田》、《秦风·黄鸟》、《陈风·宛丘》、《唐风·山有枢》、《大雅·绵》五首诗，都是从不同的地域出发，以各地不同的风俗特征进行讨论的。更说明问题的例子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还有很多，如：

天水、陇西，山多林木，民以板为室屋。及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，皆迫近戎狄，修习战备，高上气力，以射猎为先。故《秦诗》曰：“在其板屋”；又曰“王于兴师，修我甲兵，与子偕行”。及《车辚》、《四载》、《小戎》之篇，皆言车马田狩之事。^[21]